
对《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一文的补充

刘燕军

《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刊登了邵子平先生撰写的《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一文。邵先生广征博引,将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说得相当清楚。最近,笔者查阅到一些材料,在此不揣冒昧,拟对邵先生的文章作些补充。

约翰·马吉的身份

南京沦陷前夕,侨居南京的外侨鉴于情势危急,决定援引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在南京设立一个难民区,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退的难民可以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同时谋求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1937年11月底,外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Nanking Safety Zone)。约翰·马吉牧师和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乔治·费奇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而邵子平先生文中说,马吉是“为救助城中安全区内的难民所设立的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费奇是“屠杀期间国际救济委员会执行主席”^①,对这一说法,我表示怀疑。

安全区(亦称难民区)成立后,一直没有得到日本当局承认,日

① 《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第167、168页。

本军方处处刁难,不断设置障碍,如强迫难民回家,强行关闭国际委员会的米面配给点。在此情况下,安全区无法继续存在下去。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①,马吉牧师仍为该委员会的委员。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相比,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不仅在人员组成上发生了变化,比如前者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雷伯,后者的主席是美国长老会的密尔士牧师,而且,工作性质也从原先的抗议阻止日军的暴行,救助安全区的难民,发展成为一个纯粹的非官方的救济组织,依靠捐款坚持进行人道主义工作,救助范围扩展到全南京市乃至郊区,一直延续到1941年。^②

田伯烈与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1938年1月底,乔治·费奇从南京来到上海,随身携带了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其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y)正在上海编著《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田伯烈看过纪录片后,感触很深,他建议费奇把这部片子带回美国,期望它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③田伯烈以为:“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

① (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② (日)洞富雄编:《南京事件》1(日中战争资料8),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第48页。

③ 《贝茨私人档案》,耶鲁大学图书馆藏,贝茨曾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有贝茨私人档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复印件。

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么,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① 田伯烈与美国的一些政界人士颇有交情,他给美国国会的斯坦利·K·洪柏克(Stanley K. Hornberk)写了一封信,全面介绍了马吉拍摄的纪录片,建议洪柏克看一看。^②

田伯烈直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编辑工作。因为是纪录片,影片剪接得较为简单,删除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并根据各部分的内容加上了一些英文标题。^③ 这些英文标题便是“罗森报告”所提到的影片镜头目录。田伯烈还从马吉的影片中翻拍了一些照片,准备用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④。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照片后来并没有在田伯烈的书中出现。

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共制作了四部拷贝。我们从“罗森报告”中还可得知,拷贝是上海柯达公司负责制作的。^⑤ 邵子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明了三部拷贝的下落:一部送给了德国驻华大使馆,一部送给了一位英国传教士,一部被费奇带回美国。其实,第四部拷贝也被带回了美国。田伯烈在给美国国会洪柏克的信中曾提到这一情况。1938年2月上旬,于连·安诺德(Julean Arnold)从上海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回美国,亲自把一部南京大屠杀纪录片拷贝送往美国国会。^⑥ 这部拷贝大概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存放的那部《中国被侵略》。

这样算起来,加上马吉的原有拷贝,带回美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共有三部,两个版本,一部是马吉版本,两部是费奇版本。

但是,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并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

①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第104页。

② 《贝茨私人档案》。

③ 《贝茨私人档案》。

④ 《贝茨私人档案》。

⑤ 《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74页。

⑥ 《贝茨私人档案》。

注意。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在其长篇巨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这部影片。”不仅如此，“影片的某些片断被‘美国第一’委员会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① 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影片在中国的传播

1947年初，南京军事法庭（即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南京大屠杀凶犯，法庭放映了马吉拍摄的影片。当年参加过法庭旁听的史金城证实，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法庭放映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处提供的实录影片。^②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为借用影片致该部特种勤务处函称：“查本庭受理谷寿夫战犯一案，业经定于2月6日下午2时起，在励志社连续公审。对于《中国之抗战》影片一部，实有当场开映之必要，相应函请查照，转飭电影放映第39队，届时携带该片到庭开映为荷。”^③ 《中国的抗战》大概就是弗兰克·库柏编导的《中国的战争》，含有马吉影片的许多片断。另一位参加过旁听的田翠竹回忆说，审判谷寿夫时，法庭放映过法国神父拍摄的纪录片。^④ 一定是他记错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没有法国人在南京，那部纪录片肯定是马吉牧师拍摄的。

马吉的影片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80年代以后的事。1984年，“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赴北京

①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张震久、周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4页。

② 《江苏文史资料》第1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页。

④ 《团结报》，1986年9月6日，第四版。

查阅资料。在中央电影资料馆,他们发现美国与加拿大合拍的《中国近代史》电影资料片中有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在电影资料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复制了有关的部分资料片。后来,这部分内容被编辑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作为展品的一部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在纪念馆广为放映,效果良好。为了扩大宣传,纪念馆工作人员还把这部纪录片加以复制,配有中、英、日三国语言解说词,对外发行。

1991年,美国发现了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海外友人拿着马吉的纪录片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交流,当他们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后,大吃一惊,因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不少镜头与马吉纪录片中的镜头完全一样,如日军入城式、难民区惨景、中国难民在鼓楼医院治伤,等等。^①1991年10月初,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到南京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他们试图证实李秀英就是曾在马吉纪录片中出现的那位被刺刀刺伤后横躺在鼓楼医院病床上的年轻姑娘。^②其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早就对此作了说明。

马吉影片的重新发现,证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史料应用上的真实性。这部纪录片将会被越来越多的群众观看。历史是不朽的。马吉牧师如果灵魂有知,他应感到慰藉。

(作者单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① 这些镜头都是从《中国近代史》资料片中剪接而来的。费奇版本拷贝的大部分内容都能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找到。

② 《参考消息》,1991年10月14日,第二版。